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儿童文学主题写作路在何方

□林彦

首先我要承认,本文的题目是套用儿童文学作家萧袤的主题演讲《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路在何方》,我的模仿,不仅是因为这篇演讲精彩,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百年之后,未来的创作者、研究者、出版人和读者,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会有哪些作品依然存在?有哪些儿童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形象会经受住时光的淘洗并被后人津津乐道?

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处于中国少儿书业黄金十年(抑或是二十年)的尾声。这些年众多的儿童文学获奖作品和畅销书,我看了不少。不可否认,这十几年确实是儿童文学最兴盛的时期,出版繁荣,创作的题材、风格和艺术探索都有重要的拓展。近年来,我发现自己接触到的儿童文学作品,主题写作的比重越来越大,短短两年内,我读过的作品包括谱写红色历史、描绘英雄人物、扶贫支教、南水北调工程以及科技报国与生态环境保护……每翻开一本书,都曾有过兴奋期待,结果读了几页就往就失望乃至沮丧。这里面是有艺术精品,然而极少,更多的是平庸的作品。

我打电话问萧袤,一百年后,当下的主题写作童书,有多少会以艺术的形式留存下来?他说,答案是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我并不质疑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对于弘扬时代精神,传承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写作是有必要提倡的。有作家打过一个比方,儿童文学作品有的像水果,有的像坚果,主题写作类似于坚果,可以给孩子的精神世界补充钙质。我赞同这个观点——问题是我们把中国故事讲好了吗?

以我的理解,主题越重要、越宏大,写作难度就越高。我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儿童文学的写作类别如果像童谣,像民谣,像校园歌曲,那么主题写作就有一类歌咏,对演唱者的声线和艺术素养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可现实情况是,相当多的写作者对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是有误读的。也许是因为童书出版的繁荣,写成人文学作品的作家也纷纷跨界写儿童文学,跨界当然是好事,会拓展儿童文学创作的边界与维度,但有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了解儿童文学的创作规律,写的时候带有一点居高临下和漫不经心,那可能就会起反面的效果。

前不久我读过一部主题写作的小小说,内容是写一个乡村男孩失去了父母,因贫困辍学,他得到了乡村扶贫干部与各界的救助,回到学校读书,并且要继承父亲栽种人参果的技艺,建设家乡。作者以前是写成人文学作品的,文笔很好。但是,作者似乎感觉儿童文学好写,只要浅一点,主人公年龄小一点,就可以了,再加一点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內容,就有了主题的加持,出版发行都不难。他希望我给这本书提提意见,我实在无从说起,只好推荐他去看看一本书——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路边的孩子》,这本书可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文学应该怎么写。

我的看法主要有两点。第一,不是写到了儿童就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需要写出童趣和成长绽放的光芒,这种光芒有时会改变生活环境和命运,就像《铁路边的孩子》,这本书也写苦难,但是表达方式不残忍,不抱怨,而是以孩子特有的良善和快乐去热爱这个世界,给生命指一个有希望的方向。第二,儿童文学难免会表现幼稚,但不等于幼稚地去表现。儿童文学是从高向低攀登的艺术,有些创作可以举重若轻,儿童文学创作应当举重若轻,这个轻不是指内涵,是飞扬的创意、童趣与灵感,要用简单呈现复杂,用清淡表达深刻,如同绘本《失落的一角》,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白纸几根线条,却能让9岁到99岁的人读出不同的味道,孩子看到游戏,年轻人看到目标,中年人看到过程的重要性,老年人看到学会放下才是圆满。经典的儿童文学如同交响乐,没有文字却大于文字;或者像围棋,只有黑白两色,却变幻无穷。

所以,理解这个规律的人都明白,文学的本质是慢。作

家陆梅曾说:“倘若以慢的耐心,精心打磨,也许会等出一部部朝向经典的畅销作品。我们应该有宁缺毋滥的写作精神和出版精神。如此,中国儿童文学真正的黄金期才可预期。”不过,现实情况是国家提倡主题出版,要求讲好中国故事,出版行业和写作者面对这一利好,都按捺不住地抢,抢题材,抢资源,抢奖项,故事讲得好不好先不管,该抢的机会首先要抢到。

于是,有很多人在强写命题作文。例如有出版社想抓南水北调和移民村建设的题材,请一位作家写这本书。作品出版了,我读完有些失望。这本书写得非常概念化,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流于扁平。尽管这位作家的写作技巧相当娴熟,仍然暴露出主题写作的各种问题:用概念去图解主题,用立意去掩盖细节,用情节快进去补充单薄。

于是,有了大量的重复创作和出版。假如某个题材比较热销,就有相当多的出版单位搞同类复制,换一批作者、换个角度再写一套。也有作家发现自己创作过的某一类书好卖,就会自我重复,写一本变成写一套,再从一套到写成几个系列,导致泡沫化的写作盛行,造成资源浪费。

于是,写作者忍不住要抢快车道。主题出版需求仿佛一个漩涡,将众多作家吸入其中。成名的作家稿约不断,青年作者发现出版门槛在不断降低,愿意沉下心来打磨作品的人越来越少。结果作品是出得飞快,但是作品里应有的童心、童趣、真性情都丢在后面,跟不上来。我读过一本写老北京传统文化的小说,描绘了北京的风味食品、钟鼓楼附近的老手艺人、天桥的杂耍,看得出来,作者对描写的生活是熟悉的,他大概想写出另一版本的《城南旧事》,但是故事情节明显碎片化,人物形象没有立起来,等同于一个符号,把各种文化元素挂在这个符号上。如果作者多加打磨,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繁荣,是积极参与主题写作,实际上是对主题写作不够尊重。

如何算是尊重主题写作?我认为其实就是尊重创作规律,作品质量的高低跟主题是否重大没有直接关系,一切题材包括主题写作,可以写得很精彩,也可以写得很平庸。最近我读过一本小说《老师,水缸破了》,这是伊朗作家胡桑·莫拉迪·凯尔马尼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位老师在偏远乡村支教的故事,在题材上与我们常见的主题写作比较类似,但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写得光芒四射。国内的主题写作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比方说《乒乓响亮》,这本书跟体育强国的时代特色有关,呈现了以自我超越为核心的童年精神,算是主题写作,但是作品的表达不扁平,不教条,不概念化,而是语言有自己的腔调,人物形象鲜活有趣,特别是细节,呈现出毛茸茸的质感。我在一篇读书笔记里说:“刘海栖先生用这本书为主题写作创下了一个范本。他有一点点像内斯比特在创作《铁路边的孩子》,善于把故事写得美好但不直接,如同伦敦雾的天气,站在窗口,才看得见房子里亮着暖暖的灯光,杯子里的红茶也正冒着热气。我们迫切需要学会的就是那一点不甜腻的叙述味道,学会适可而止的抒情。”

再套用一下萧袤的演讲,好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需要一点废名的苦心孤诣:“我像唐人写绝句一样写小说。”也需要安徒生的格局:“我在给小孩写童话时,也想让他们站在他们身后的大人看一看。”

说到底,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到底路在何方?

相信每个真诚的写作者和出版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已故评论家刘绪源先生曾说,作家自律,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创作要求;批评界要诚实,增强艺术批评,重视艺术分析;各类评奖要扭转主题第一或市场第一的倾向。

至于我的答案,就是大家尊重常识,尊重内心,尊重主题写作——这是机遇更是挑战。终究是要有敬畏之心。

敬是因为挑战,畏是因为热爱。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湖北省作协儿委会副主任)

如何使儿童小说主题创作的政治性、文学性、儿童性有机融为一体,如何让儿童文学“小丫扛大旗”,避免追题材、赶时间、编故事、塞风俗的仓促、拥挤和同质,提升文学性、儿童性,这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毫无疑问,儿童小说主题创作涉及到重大题材、重要节点。世界、祖国、战争、和平,均为大词,儿童小说更在乎的是“小”,小孩子、小细节。正如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把《小王子》“献给还是孩子时的这个大人”,因为“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可是他们中间不大人记得这一点)”。在主题创作中,作家的童年记忆发挥什么作用?作品中的儿童会有什么独特行动?其实,也就是作家怎么处理小与大、轻与重的关系。

2015年,我应浙江省对口援疆指挥部之邀,前往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那片绿洲,采访援疆教师。西部开发、丝绸之路都是热点,那是当之无愧的“大”,但我在其中领略了“小”。一位援疆女教师说起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怎么形成“祖国”的概念。此前,他只热爱家乡的这座小县城,但他自觉地关注“中国地图”,定位母亲援疆的“绿洲”,跨越时空,这对母子联系在一起,那小男孩还养了蚕宝宝,那是丝绸之路的小生灵。

由此,我联想到我童年的地球仪。4岁到23岁,我没走过“邮票大”的那片绿洲农场,小时候,以为那就是整个“世界”。当上海边青年教师拿着地球仪进教室,我第一次见识还有那么大的“世界”存在,我寻找我生活的农场。老师解释,因为地球仪小,标不出“我们的农场”,我当即否定:连我们农场也不在上边,那算什么“地球”!

我读陆梅的儿童小说《万花筒》和薛涛《桦皮船》,就想到蚕宝宝和地球仪,小中容大,以小示大。我看出两位儿童小说作家的童年记忆,某种意义上说,借由万花筒、桦皮船这童年象征性的小物件,唤醒了作家心里住着的童年。《万花筒》的故事情节相当简单:一个叫麦小节的9岁小女孩,从乡下来到上海奶奶家,结识了阁楼名叫白雪的11岁的又聋又哑的小女孩。通过麦小节在远洋轮上工作的父亲送的万花筒和望远镜,两个小女孩不足一个月,结成了深厚的友情。万花筒将家乡、上海、世界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意象系统,承载了两个小女孩的发现、发明的欢喜。万花筒作为友情的媒介、信物、礼物,妥帖地呈现了大与小关联。而且,在小说结构上,也以小博大,每一次旋转为一章,八次旋转,像打开一扇扇升华之门。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的重要区别是不仅讲一个故事,也要有审美意味的形而上的运用。陆梅通过两个小女孩的视角,扎实地写了形而下:日常生活饱含着人间烟火,人情温暖,那是陆梅在上海生活几十年的经验呈现,更是她通过万花筒唤醒了童年的自己。我出生在《万花筒》所写的石库门,能感受小说中的气氛、气息,有灵性有诗意的万花筒也是小说的主角。每个成人都有童年的万花筒,所以我看到当下的小孩好奇地旋转万花筒,就仿佛邂逅了童年的自己。

陆梅让童年的万花筒浮出久藏的记忆,转入当下的主题创作,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些主题创作的作品,可以看出,作家来自网络搜索和历史资料的转化存在着痕迹,往往粘和塞,是洗净的题材之萝卜不带生活之泥,像超市的包装。我在乎的是“泥”,那是作家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创作前已积存,只不过,这种记忆的土壤承接了主题创作的种子。

薛涛认为,主题创作大多以“命题作文”的形式出现。不过,要具有文学性、儿童性,起支撑作用的还必须要有童年的经验。童年经验与主题创作由某个有意义的细节来激活。薛涛创作《桦皮船》前,曾当过三年的驻村干部,数次进入兴安岭,那里葬着他的祖辈,藏着他的童年记忆。读《桦皮船》,能感到桦皮船划出童年的记忆的同时,又行至他的成年,童年记忆与主题创作——记忆的小船划入现实的河流,一次文学的邂逅和融合,创作顺流而下。

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万花筒》《桦皮船》是和平年代的故事。小时候,在沙漠边缘的绿洲,小男孩特别喜欢玩“打仗”的游戏,看“打仗”的书,我们的父辈都是战火硝烟过来的老兵。至今,我还是喜欢看“战争片”,在沉重的战争环境里,儿童做什么和怎么做《鸡毛信》《小兵张嘎》应当属于现今所说的主题创作。我小时候看过连环画、电影和原著,记得小孩的行动方式:赶羊群送鸡毛信,抱麦草点炮楼。信和草之轻肩负起战争之重,战争中的小孩是以轻博重。

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在儿童小说《第94只风筝》里以儿童的方式处理了战争与和平。巴以之间筑起了一座高墙,巴勒斯坦男孩塞德接替在放风筝时惨遭射杀的哥哥,继续放风筝。风筝飞过高墙,终于被以色列女孩接收。沉重的战争、高墙、死亡,由承载着和平、希望、生命的风筝所超越。这就是两个小孩对待战争与和平的儿童独有的方式,以轻抵重。一轻一重的风筝,高墙就有了象征意味,从而升华了儿童小说的审美品质。

小孩本能地会选择小物件:万花筒、桦皮船、鸡毛信、风筝……小孩总会在轻逸的小物件里投放或寄托灵性和向往。由此,儿童小说在审美意义上和主题传达上获得了新意和升华。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浙江省作协特约研究员)

拔出题材的「萝卜」带着生活的「泥」

□谢志强



主题写作作为近些年儿童文学界的重大创作和出版现象,业界的关注、议论颇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主题创作十分重要,主题创作与主题出版应该做得更好。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湖北作家林彦的文章,结合作者近年来阅读的作品,认为“强写命题作文”“大量的重复创作和出版”“愿意沉下心来打磨作品的人越来越少”等创作现象,“表面上看是繁荣,是积极参与主题写作,实际上是对主题写作不够尊重”。作者认为,应该“尊重常识,尊重内心,尊重主题写作”。

浙江作家谢志强的文章,通过对中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分析,提出主题写作应“处理好小与大、轻与重”的辩证关系。他关于“小孩总会在轻逸的小物件里投放或寄托灵性和向往”的观点,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值得玩味的。

就我个人近年来的阅读观感来看,投入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作者,常常在相关题材的创作中,生活、艺术方面的准备明显不足。而在立项、宣传、评奖等“文学生活”中,这些作品又比较容易获得“倾斜”和“照顾”。这样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改进。事实上,远离了童年的哲学和艺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风光”的作品,是无法真正赢得读者和岁月的。

——方卫平



■关注

“她”是儿童电影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林阿锦

1981年3月,党中央两次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把下一代培养好,使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在这一重要精神指导下,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当年6月1日成立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儿影厂),并委派表演艺术家于蓝任厂长。她在没有设备、没有资金的艰难情况下,团结各界人士,争取援助,创建了现代化设备的办公大楼。开创了以“儿影”为骨干的,具有示范作用的儿童电影的新里程。

建厂第一年,首次投拍的《四个小伙伴》,由于展现了新中国儿童幸福生活和高尚品德,深受国内外孩子喜爱,相继在意大利、法国和伊朗的电影节上获奖,次年拍摄反映兄弟民族地区儿童生活的《应声阿哥》及《红象》更是受到好评。1987年3月,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更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童影厂),此后,该厂的创作和生产迈出了更矫健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童影厂独创了以往从未摄制的崭新题材。首先是拍摄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儿童戏曲片《岳云》《沧桑梨园情》《娃娃唱大戏》等片,小观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又领略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还有凝重深邃的传记片《少年彭德怀》等,聂耳、孙文、鲁迅、雷锋等人物的青少年时代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地展现在银幕上,为当代儿童少年树立起人生的楷模;此外,

充满幻想、探索色彩的现代童话片有了新的突破。《霹雳贝贝》令人神往的魔力使小观众欣喜若狂。《大气层消失》以环保为主题,艺术构思奇特的样式,对儿童片创作和故事片的发展有所启发;如诗如梦、美好灿烂的青春类型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重头戏,《多梦时节》《哦,香雪》等展示一代新人树立远大志向,满怀信心迎接新世纪的风采,《火焰山来的鼓手》更是颂扬兄弟民族少年成长经历的佼佼者,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举行了“儿童故事片剧本征文”活动,获二等奖的《豆蔻年华》形象地让青少年懂得竞争与道德的关系,尊重平凡的劳动,珍惜友情,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教育界、影视界的好评。

自1976年始,在柏林电影节举办时还有一个儿童电影节,但十几年来,我国从未有儿童片前往参赛。直到1990年底,德国摄影家李博德先生二人来中国访问,笔者向他们介绍中国儿童电影的状况,并播放了刚摄制的《哦,香雪》影片,德国友人观赏影片赞不绝口,并一再追问:这样优秀的影片为什么不到儿童电影节参赛?由于时间紧迫,即刻委托德国友人回国后向儿童电影节组委会洽商此事,得到对方首肯后,立刻将《哦,香雪》录像带寄到柏林。两周后,影片被选中入围参赛,同时给童影厂发来两份邀请函。广电总局电影局确定由原厂厂长

锦徽及王好为导演二人携带拷贝参赛。

这是我国首次参加这样的儿童电影节盛会,由于组委会做了精心安排,委派女翻译做现场解说,帮助孩子了解剧情。首场的放映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观众完全被这部佳作征服。放映结束,导演与观众在会议室展开热烈交谈。一位德国老人始终站在门旁耐心等待。交谈结束,导演请翻译询问老人有何意见。老人与导演热情握手,说道:“非常爱这部影片,这样宁静,这样美丽。比起这些姑娘,我们是贫穷的,而她们是富有的。”7位成人评委的评语是:“以很高的专业水平,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以细腻的手法反映了中国一个偏远山村同现代生活的联系。”影片获得第41届柏林电影节的第14届儿童电影节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中心奖,影片被德方购买在全德和北欧的电视播映权。1994年德国还做了《哦,香雪》的16毫米拷贝发到各个城市,作为德国中小学校的影视教材。

1991年,笔者以文学编辑身份参与拍摄了由长春导演的《火焰山来的鼓手》。再次将录像带寄送电影节组委会,很快得到同意参赛的答复,并寄来邀请函。次年年初,我与长春导演带着拷贝前去参赛,这部体现20世纪90年代新疆风情和维吾尔族少年超群出众才华的影片,深受德国孩子们的喜爱,放映时气氛活跃,笑声不绝,映后导演的见面会也很热

烈。柏林国际儿童电影节共设三个奖,其中的儿童评委奖是由11名11至14岁的学生组成评委会单独评奖。那年小评委的评语是:“中国影片最大的成功是表现了儿童世界的有趣生活,塑造了一群可爱而有才华的儿童形象,歌舞美,服饰美,风土人情美。”该片荣获第42届柏林电影节的第15届儿童电影节儿童评委一等奖。

在闭幕式的领奖台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得·哈德尔紧握中国导演的手说:“祝贺你们荣获儿童评委奖,希望今后有更多这种为孩子们喜爱的影片参加电影节比赛。”当把奖品——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熊(柏林城徽)递到长春兰手中时,全场沸腾了。这次获奖使中国电影代表团振奋,曾庆瑞团长说:“儿童评委代表了儿童的呼声,很特殊,很有意义,为中国争了气,为代表团撑了腰,感到十分光彩。”1993年,我们推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王君正导演的《天堂回信》参赛,这部围绕着爷孙两代深情关爱,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童真童趣,聚焦于日常平凡生活中点点滴滴温馨的小故事,再一次征服了德国小观众,并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的第16届儿童电影节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中心奖。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儿童电影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少儿学会决定此时到美国举办电影展,得到美国太平洋彩虹有

限公司的全力赞助和支持。我和学会会长陈锦徽、北影导演王君正三人组团前往美国休斯敦举办影展。影展开幕式安排在莱斯大学媒体中心,活动现场放映了《鹤童》,数百名孩子、家长和来宾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部表现我国扎龙自然保护区小学生爱护仙鹤的影片。

优秀的儿童片是“造就我们的接班人”重要的艺术教材。截至2019年,童影厂已拍摄了132部影片,其中59部获国内外143个奖项,说明童影厂对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肩负着重要使命,童影厂把优秀儿童片推介到世界各国,1989年始,还在北京及祖国各地举办过13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80余部影片来参赛参展,为中国编导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又开阔了小观众的视野。童影厂为儿童影片编导人员交流、学习,悉心培养年青的儿童影视人员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和家园,收集、整理了许多珍贵影片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儿童电影编年记事(1922—2011)》等具有历史价值的书籍。

由此不难看出,童影厂是推动中国儿童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基地,也成为儿童电影工作者信赖和依托的精神家园,她的历史值得我们铭记。

(作者系文学编辑、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原常务副会长)